

最低工资的经济结构效应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范玉波¹, 刘小鸽²

(1. 山东社会科学院 政策研究室, 山东 济南 250002; 2.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具有经济结构效应。利用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三次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结构效应。利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检验计量回归结果,表明结果是稳健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了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但对出口中的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业比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最低工资制度促进转型升级的同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及加工贸易竞争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 最低工资; 结构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 产业结构; 准自然实验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6)01-0040-09

DOI:10.13269/j.cnki.ier.2016.01.005

一、引言

美国1938年第一次以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形式规定了最低工资,即雇主可以支付的最低劳动力价格,以保证工人最低的适当生活水平。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报酬一定意义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所以有必要对劳动者的最低收入做些限定,1993年中国以《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为标志开始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一些研究表明国家的政策干预确实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工资扭曲现象^[1]。随后一年颁布的《劳动法》明确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律地位,但真正地在全国推开是2004年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以后,其明确了一些细则,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考虑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了制定最低工资的职能部门,通过比重法或恩格尔系数法进行测算。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2013年多部委联合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最低工资规定》出台以后,普遍出台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总的来看,

收稿日期: 2015-07-22; 修回日期: 2015-11-16

作者简介: 范玉波(1974—),男,山东定陶人,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刘小鸽(1989—),男,山东嘉祥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11DJJZ03)

近年来的最低工资呈现出一个加速增长的过程,调整频率加快,调整幅度加大,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与时间差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各省市人力保障部门公开的数据,1997年以前除上海为310元外,其他省市均不超过300元,到了2008年绝大多数省市在550~750元,2013年所有省市均超过1000元,最高的上海达到1620元,如表1所示。1994—2004年的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率为7%,而在实施《最低工资规定》之后,2005—2013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2005年后,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率都要显著高于2004年之前。从1993年至2014年各省市自治区对最低工资的调整在8~13次,但在2008年以后调整次数都在5次左右,调整频率也显著加快,2004年及之前年均仅调整0.45次,而2005年之后各地年平均调整次数超过0.64次。

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贫困,防止严重的分配不公,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劳动义务后应获得的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劳动收入。但在运行中,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影响工资与就业,最终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一些地区甚至希望利用最低工资制度改变产业的低端锁定,改变其产业结构,促使产业向高端演进。国务院《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4年)》明确提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要达到13%以上,这将是一个较大的外界冲击变量,势必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发展效应,特别是产业结构效应,所以,研究最低工资的结构效应,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既有文献,探讨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将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最低工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借此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 结构变迁逻辑

“卡尔多事实”指出了多部门经济体系中的稳定性资本产出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实际利率等都保持稳定^[2]。与此相对的“库兹涅茨事实”则体现了部门之间非均衡发展及结构变迁的过程^[3]。Herrendorf *et al.*^[4]综述研究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产业变迁的内生特征,主要是从需求与供给的角度解释驱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的收入增加,由于产品的收入弹性差异,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引起了对产业产品需求产生变化,使得劳动力发生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变迁。从供给的角度看,由于各部门之间的技术进步率与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变迁。假设产业2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产业1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部门1劳动者收入向部门2看齐,由于存在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的原因,产业2的产出增加,相对价格下降,引起要素价格下降,导致要素从产业2部门流向产业1部门,引起结构变迁^[5-6]。

以林毅夫等为首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是由其特定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7-10]。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主要是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另外基础设置(包括硬软基础设置,硬基础设置如公路、机场、港口、电力、电信系统等公共设施,软基础设置如制度、社会资本、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被看成是经济体要素禀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与资源相对资本来说较丰富,其发展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有比较优势,可以优先发展这些产业。

表1 2013年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 元

省份	最低工资	省份	最低工资
山东	1 380	福建	1 200
广东	1 550	江西	1 230
北京	1 400	河南	1 240
上海	1 620	湖北	1 300
天津	1 500	湖南	1 265
陕西	1 150	广西	1 200
重庆	1 050	海南	1 120
江苏	1 480	四川	1 200
浙江	1 470	贵州	1 030
河北	1 320	云南	1 265
山西	1 290	西藏	—
内蒙	1 200	甘肃	1 200
辽宁	1 300	青海	1 070
吉林	1 320	宁夏	1 300
黑龙江	1 160	新疆	1 210
安徽	1 260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不断变迁的要素禀赋结构带动着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工资影响着劳动者的供给结构。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不同,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应着有差异的最优产业结构。如果经济体要升级其产业,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就需要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需要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当然,产业变迁的快慢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升级的速度,还要看基础设置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基础设置会促进或延缓经济的产业升级。什么是最有效的产业升级途径,或者说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需要存在一个能反映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的价格体系,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越是竞争的市场体系,产生的价格才最有效,最能反映其稀缺性与丰裕度,所以只有有效的市场才能促进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另一种角度来看,如果在任何时间段产业结构对要素禀赋结构来说都是最优的,这时,经济竞争力最强,经济剩余最多,资本积累最快,那么产业结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

(二) 最低工资结构效应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基于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及相关的影响,另一个研究方向是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雇主对最低工资的提高如何反应呢?对就业效应的研究上,在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之初就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Stigler^[11]指出雇主对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将导致企业雇佣规模下降,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失业率增加,使得一部分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Neumark *et al.*^[12]与Burkhauser *et al.*^[13]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效应,支持了上述观点。但是九十年代的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支持就业减少的观点^[14-15]。他们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负效应。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雇主垄断的市场,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平衡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要价能力,最终保障劳动者的最低收益,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16]。最近的一些研究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是必须的,尤其是在诸如中国这些非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与地区。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标准面前无法平等地谈判,特别是大量的劳务派遣合约的存在,增加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利润,使得低收入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低于成熟市场和劳动力边际贡献的应得收入。

最低工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往往来源于对部门就业的影响,最低工资有很大的溢出效应^[17],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它也促使中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涨。在两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某一个部门企业适用最低工资规定,另一部门企业不适用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的提升导致适用最低工资制度的部门企业劳动力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从而增加这一部门就业竞争的强度,弱化另一部门的竞争力。最低工资的提升改变了企业或行业的生产成本,挤压企业的利润,促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Wakeford^[18]利用南非的数据进行研究,也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短期内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效应,但在长期却具有正效应。Huizinga^[19]则持相反观点,利用荷兰的数据指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正效应,在长期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会增加失业和通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最终体现在行业的竞争力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最低工资的快速提高,可以增加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工资负担,从而接近这些企业的利润红线,进而可以淘汰落后产能和低端产业,并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但是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得企业业态发生变化,中小企业是吸纳低收入者(诸如农民工、城镇低技能职工、新毕业大中专技校生)的一个主要载体,使得本来就融资困难、缺乏政策支持的中小企业生存更加困难。此外,降低了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会增加外迁的可能性。

三、最低工资提升引致产业结构变动的机制

(一) 服务业开放限制背景下的制造业转移

服务业是中国限制开放的领域,包括金融、电信、运输、互联网服务等产业,直到2015年5月,北京市才成为中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开始降低多项外资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变

革服务监管模式,服务业扩大开放力度逐渐加大。最低工资的提高,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影响一部分二次产业,使其竞争力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服务业开放限制,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随着最低工资的提高,国外对华投资增速降低,尤其在劳动力成本敏感的行业影响更为明显,已有的在华投资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也开始转移到境外寻求发展。因此,在国外资金对中国服务业影响较小的背景下,第二产业外迁将使得国内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相应的服务业比例上升。

(二) 最低工资提升的收入效应

随着最低工资的提升,带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者的收入也随之增加。收入的增加带来了福利改善与消费模式的变迁。根据广义恩格尔定律的解释,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是更多地从对物质产品消费转向非物质产品消费,增加了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也就是增加了第三产业的需求,最终会提升第三产业比例。

四、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实证检验最低工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相对分散,我们参考产业结构变迁领域的既有文献,选取了主要的影响变量作为本文实证检验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ext{STRUC}_{it} = \alpha + \beta \text{MWAGE}_{it} + \lambda X_{it} + \sigma_i + \mu_{it} \quad (1)$$

其中 i 代表所属省份, t 表示相应的年份, α 为截距项, μ 为随机干扰项, σ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被解释变量 STRUC 为经济结构变量,本文选取四个衡量指标: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比例以及出口中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所占比例。核心解释变量 MWAGE 为 i 省 t 年的最低工资。控制变量 X 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境外投资、人均研究与实验发展投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均矿产资源新增投资。此外,为了避免方差与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是指相应的产业比例关系,主要为三次产业结构的第二与第三产业,文中为了深化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情况,利用各地区出口中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业等比例关系来反映其细化的产业结构变迁状况。第二与第三产业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出口结构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区的 2008—2013 年度的统计公报,少数未在公报中体现的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或商务厅的出口情况总结。

2. 核心解释变量: 最低工资水平

本文对最低工资的界定是各个省市区每年公布的最低工资的数额(第一档)。极少数的省份在某一年度调整了两次最低工资标准,此时以最后一次调整数额为准。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区的劳动保障厅发布的公告或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

3. 控制变量

影响经济结构变迁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与外商投资等方面。

自然资源禀赋代理变量沿用徐康宁和王剑^[20]做法,采用采矿业年度投入作为产业结构的资源约束变量,无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制约,它都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对最初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

人均 GDP 与人均国外投资则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受到国外投资的影响水平,国外投资通过直接嵌入的方式对一个地域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通过技术溢出等方式对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规模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规模报酬递减还是规模报

酬递增理论,产业规模往往对应着内部的产业调整与变迁,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反映一个地区产业的规模。人均GDP、人均国外投资、人均采矿业投入与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为利用2009—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计算所得。

由于西藏数据的缺失,本文选择了除西藏外30个省市区数据。虽然中国2004年已经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但是从收集的资料来看,一个相对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在2008年以后才在各省市区建立起来,所以本文选择了2008年以来的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统计显示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偏低,均值只有40.6%,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出口中,高新技术产业比例仍然偏低,均值只有17.4%,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此外,最低工资的均值为951.1元,最小值只有560元,最大值有1620元,可见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最低工资(元)	180	951.1	245.4	560.0	1 620.0
第二产业比例(%)	180	48.5	7.8	21.7	61.5
第三产业比例(%)	180	40.6	8.7	28.6	77.5
出口中加工贸易比例(%)	180	25.9	18.9	0.3	97.0
出口中高新技术比例(%)	180	17.4	14.7	0.1	57.6
人均GDP(元)	180	36 660.5	19 114.2	9 904.2	98 111.5
人均国外投资(美元)	180	2 398.2	3 461.3	89.4	19 240.9
人均R&D(元)	180	660.9	912.1	38.6	5 602.8
人均采矿业投资(元)	180	1 044.1	1 108.7	0.7	6 353.8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	180	23 206.2	10 825.0	5 184.8	62 026.2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最低工资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Hausman 检验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依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安排对产业结构的倒逼效应。

估计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提升对第二产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并且统计上显著,最低工资每提高1%,第二产业比重降低0.136%,见表3第(1)列。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工资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受冲击较为明显。采矿业投资往往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代理变量,其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显著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在决定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

提高最低工资对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有效的正向驱动效应,最低工资每提高1%,将使得第三产业占比提高0.0985%,见表3第(4)列。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对第三产业的提升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而科技投入R&D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一个正向的作用。人均GDP和第三产业的负向关系,有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驼峰型”(hump-shaped)态势的演变期,即工业化在一段时期既表现出工业化也表现出去工业化的综合特征。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必然表现为人均GDP升高与第三产业比例的正向关系。

此外,最低工资对产业结构综合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传递。最低工资对工资进而就业的影响都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才能在产业结构上有所体现。考虑到“工资粘性”,在回归时,本文用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的最低工资水平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最低工资水平的回归结果比当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更大,也更为显著。虽然滞后二期的影响程度也更大,但是已经不再显著。

表3 最低工资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均取ln)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1)	(2)	(3)	(4)	(5)	(6)
最低工资	-0.136*** (-0.0504)			0.0985* (-0.055)		
最低工资滞后一期		-0.142*** (-0.0402)			0.123*** (-0.0455)	
最低工资滞后二期			-0.362 (-0.331)			0.345 (-0.347)
人均GDP	0.452*** (-0.0833)	0.454*** (-0.068)	0.226** (-0.105)	-0.458*** (-0.091)	-0.514*** (-0.0769)	-0.288** (-0.11)
人均境外投资	-0.0148 (-0.0205)	-0.0287 (-0.02)	0.0234 (-0.0389)	0.0145 (-0.0224)	0.0247 (-0.0227)	-0.029 (-0.0407)
人均R&D经费	-0.0606 (-0.0395)	-0.105** (-0.0456)	-0.0937 (-0.0644)	0.107** (-0.0432)	0.168*** (-0.0515)	0.127* (-0.0675)
人均采矿业投资	0.0318*** (-0.00876)	0.0144 (-0.00948)	0.029 (-0.0176)	-0.0220** (-0.00956)	-0.0118 (-0.0107)	-0.0308* (-0.0184)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0.201*** (-0.0435)	-0.159*** (-0.0426)	-0.148** (-0.0588)	0.231*** (-0.0475)	0.197*** (-0.0482)	0.214*** (-0.0615)
常数项	2.364*** (-0.348)	2.265*** (-0.323)	3.768*** (-0.728)	4.867*** (-0.38)	5.333*** (-0.366)	3.709*** (-0.762)
观测值	180	150	120	180	150	120
Huasman(p值)	0.00	0.00	0.01	0.00	0.09	0.07
模型选择	FE	FE	FE	FE	FE	FE
R ²	0.314	0.344	0.338	0.362	0.388	0.506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 最低工资制度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为了更为详细地考察最低工资安排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通过分析产业内高新技术与加工产业的比例变动关系来了解最低工资的调整对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出口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尽管存在些许差异,但是,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又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变。我们选取各地区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所占比例与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作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可以考察最低工资安排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管窥最低工资的调整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由表4第(1)列、第(4)列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提升对中国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比例及高新技术产业比例均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作为加工贸易的出口大国,总体上处于加工产业链低端,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是中国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的加工贸易利润较低,从大批量的鞋子、圣诞树、电动玩具等低端加工品,到电脑、苹果手机等,加工企业利润较低。比如苹果手机,尽管大部分的生产与组装在中国完成,但中国仅占每个手机利润的2%左右。最低工资提高1%的比例,将使得加工贸易比例降低约2%,具有一个放大的特征。在组装生产线的大部分劳动工人的工资,只比最低工资的标准高出少许,所以一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会影响到大批的中国低端的加工贸易企业,使他们的劳动成本上升,低工资雇佣工人变得困难,最终会影响到加工贸易在整个出口中的比例。在二三产业的回归分析当中,最低工资对第二产业有一个负向的作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应是在加工产业上。即使其中一些被划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含量仍不高,竞争力来源仍是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劳动力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非常大的冲击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调整阶段,这一时期最低工资一直处于上升期,政府试图通过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出口中产业竞争力源泉的调整却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导致最低工资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业在出口中所占比例具有负向关系。

表4 最低工资制度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变量(均取ln)	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比例			出口中高新技术所占比例		
	(1)	(2)	(3)	(4)	(5)	(6)
最低工资	-2.008 *** (0.570)	-1.949 *** (0.568)		-1.391 ** (0.663)	-1.369 ** (0.658)	
最低工资滞后一期			-0.161 (0.543)			-0.194 (0.670)
人均GDP	2.131 ** (0.943)	1.743 ** (0.875)	0.407 (0.932)	0.030 6 (1.096)	-0.115 (1.012)	-0.321 (1.150)
人均境外投资	-0.254 (0.232)		-0.303 (0.272)	-0.095 0 (0.269)		-0.173 (0.335)
人均采矿业投资	0.043 1 (0.099 2)	0.063 1 (0.097 6)	0.077 0 (0.129)	-0.070 6* (0.115)	-0.063 1* (0.113)	-0.031 4 (0.159)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0.648 (0.492)	-0.693 (0.491)	-0.372 (0.585)	0.744 (0.572)	0.727 (0.568)	0.774 (0.722)
人均R&D经费	0.694* (0.448)		0.376* (0.617)	0.725* (0.520)		0.094 1* (0.761)
人均R&D经费滞后一期		0.868 ** (0.418)			0.791* (0.484)	
常数项	-1.744 (3.941)	-0.619 (3.808)	2.825 (4.185)	0.917 (4.578)	1.337 (4.407)	0.139 (5.161)
Huasman(p值)	0.00	0.00	0.46	0.0	0.06	0.74
模型选择	FE	FE	RE	FE	FE	RE
观测值	180	180	150	180	180	150
R ²	0.198	0.191		0.146	0.145	

注: 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准自然实验的方法

“准自然实验”方法是借助政策的突然变化带来的冲击以识别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国外较早使用此方法研究最低工资的冲击效应,Card and Krueger^[15]利用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变动来识别最低工资对快餐业雇佣员工的影响。在国内,马双和甘犁^[21]运用准实验的方法研究最低工资对在职培训的影响。本文借鉴这一思想,利用“倍差法”来探讨最低工资变动对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的影响。由于省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只是体现一个趋势性的关系。我们利用2010—2011年一些地区最低工资上涨,而一些地区维持最低工资不变,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区域经济结构变动。2010—2011年时间段中国有内蒙、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四川、甘肃与西藏等八个省市区没有进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其他23个省市区都进行了最低工资的调整。所以选取进行最低工资调整的23个省市区为实验组,其他没有进行工资调整的7个省市区(忽略了西藏)为对照组。

表5给出了23个省份在2010年与2011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工资标准较高,最高的广东与最低的陕西相差440元。变动最大的省份是河南与湖北,达到35%;变动最小的是贵州,变动为12%,其次是上海与陕西,分别为14.3%、13.2%。各省市年度调整幅度一般在20%左右,平均值为22.1%。

表5 实验组省份月最低工资调整情况

元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山东	920	1 100	浙江	960	1 140	湖北	800	1 080
广东	1 100	1 300	河北	1 100	1 310	湖南	850	1 020
北京	960	1 160	山西	900	1 100	贵州	830	930
上海	1 120	1 280	辽宁	900	1 100	云南	830	950
天津	920	1 160	吉林	820	1 000	青海	770	920
陕西	760	860	安徽	720	1 010	宁夏	710	900
重庆	680	870	福建	900	1 100	新疆	960	1 160
江苏	960	1 140	河南	800	1 080			

样本中较多的省份利于消除地域之间经济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提高实验的准确性。

表6显示最低工资调整以后,实验组的第三产业比例提高了0.09个百分点,提高比例为0.22%,

而对照组第三产业比例降低了 0.87,二者相差 0.96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两组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均有增加,但对照组增加更多,实验组略有变动,二者相差 0.97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显示最低工资的变动降低了实验组的加工贸易出口比例,而对照组在此期间有所增加,差中差值是对照组增加了 9.1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出口比例方面显示实验组的出口比例下降,而对照组比例上升,导致了二者的差别在 9.38 个百分点。

表 6 2010—2011 年实验组与对照组

		部分经济结构指标变动情况			%	
指标	组别	2010 年	2011 年	差	差中差	
第三产业	对照组	35.86	34.99	-0.87		
	实验组	41.16	41.25	0.09	0.96	
第二产业	对照组	50.34	51.39	1.07		
	实验组	50.36	50.44	0.08	-0.97	
加工贸易	对照组	17.33	22.78	5.45		
	实验组	47.75	44.05	-3.7	-9.15	
高新技术产业	对照组	13.44	19.54	6.1		
	实验组	31.74	28.46	-3.28	-9.38	

与前面的面板数据回归相比较,准自然实验显现了相同的趋势性变化,尽管变化的比例有所出入,但是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按照实验组 22% 的最低工资变动率,通过面板数据计量结果得到的系数来推导各结构变动比例,分别为第三产业比例增加 3.0%,第二产业比例降低 2.2%,加工贸易比例降低 44.0%,高新技术比例降低 30.6%;通过准自然实验得到的产业结构变动比例,分别为第三产业比例增加 2.3%,第二产业比例降低 1.9%,加工贸易比例降低 19.2%,高新技术比例降低 29.6%。除加工贸易比例出入较大、不够稳健外,其他三个产业变动比例相近,总体上印证了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六、结论

我们利用 2008—2013 年 30 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变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效应:(1) 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促进了第三产业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对中国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有可能对就业以及各个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2) 中国总体的出口额仍在增加,从总体上说,最低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但是,最低工资对出口结构的变动仍然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对加工行业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诸如税收减负等政策,降低成本,帮助高新技术产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度过阵痛期。(3) 最低工资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大,显现地区间存在阻碍要素流动的社会制度,需要政府减少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羁绊,真正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经济结构良性升级。(4) 保障最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与适度缩小两级分化,应是最低工资政策的核心,而结构效应只是在完成上述目标时的副产品,不能本末倒置赋予其更多的经济发展任务,失去这项政策的应有之义。如果政府偏离政策核心,把它当成干预经济的一个手段,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5)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六年,样本数 180 个,今后的研究拓展需要更多样本数据以及方法,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参考文献:

- [1] 杨振兵,张诚.《劳动合同法》改善了工资扭曲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5(5): 52-62.
- [2]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C]// the theory of capital, in Lutz F A and Hague D C e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177-222.
- [3] KUZNETS S.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 / by Simon Kuznet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1955, 7(2): 177-196.
- [4] HERRENDORF B, ROGERSON R, VALENTINYI A.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Z].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96 issued in April 2013.

- [5]NGAI R ,PISSARIDES C A. Trends in hours and economic growth[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8 ,11(2) : 239-256.
- [6]ACEMOGLU D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06 ,116(3) :467-498.
- [7]林毅夫. 经济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6.
- [8]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J]. 经济学(季刊) 2010(1) : 1-32.
- [9]WANG Y ,LIN J Y ,JU J. Endowment structure , industrial dynamics ,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6(C) :244-263.
- [10]LIN J ,MONGA C ,TE VELDE D W , et al. DPR debate: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3) :259-310.
- [11]STIGLER G J. 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6 36:358-365.
- [12]NEUMARK D ,WASCHER W.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and subminimum wages: panel data on state minimum wage laws[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2 46(1) :55-81.
- [13]BURKHAUSER R V ,COUCH K A ,WITTENBURG D C. A reassessment of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literature with monthly data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0 ,18(4) :653-680.
- [14]LAWRENCE F ,KRUEGER A B.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fast food industry[J].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2 46(1) :6-21.
- [15]CARD D ,KRUEGER A B.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4) :772-793.
- [16]FLINN C. Minimum wage effect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under search ,matching ,and endogenous contact rates[J]. Econometrica 2006 74(4) :1013-1062.
- [17]NEUMARK D ,SCHWEITZER M ,WASCHER W. Minimum wage effects throughout the wag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4 39(2) :425-450.
- [18]WAKEFORD J. The productivity-wage relationship in South Afric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Development South Africa 2004 21:109-132.
- [19]HUIZINGA F. Wage moderation and labour productivity[Z]. Cpb discussion paper 2004.
- [20]徐康宁 ,王剑.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1) :78-89.
- [21]马双 ,甘犁. 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3(4) :1-26.

(责任编辑: 禾 日)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Economic Structur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AN Yubo¹ , LIU Xiaoge²

(1. Policy Research Office ,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Jinan 250002 , China;

2.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 Shandong University , Jinan 250100 , China)

Abstract: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can improve the income of low-income people , and it will also have a structural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study us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3 showed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produced obvious economic structure effect. The test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proved that the results were robust.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sector , but it ha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 processing trade and high-tech industry , which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processing trade.

Key words: minimum wage; structural chang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